

# 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調查」結案報告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節 緣起

國科會人文處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推動社會科學各學門之發展，訂定「推動學門發展與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作業辦法」。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以下簡稱本計畫）係社科中心依據該作業辦法，委託進行之兩年期計畫案（民國94年8月1日至96年7月31日），本報告書係其結案報告，旨在說明本計畫之執行過程，並提出規劃之政治學門四大議題，希望能在未來的政治學領域創造、整合出更多的績優團隊，並促進跨次領域間以及跨學門間之合作。

### 第二節 議題規劃過程

在議題的規劃部分，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五人工作小組，深刻體認學門內之多樣性，經多次討論後決議將規劃之焦點集中於重要議題，而非學門內之次領域（如區域研究、比較政治等）或地理區域，以免因領域分割而忽略了跨傳統領域或地區之綜合議題（如主權與認同、全球化等）。

在實質議題方面，工作小組秉持以下四項原則，規劃政治學門之熱門及前瞻議題：

- 一、屬於台灣獨特之議題者。
- 二、國內已有基礎，並有國際競爭力，已漸形成研究團隊者。
- 三、國外已經發展，有潛力成為重要研究議題，但國內著墨不深者。
- 四、可促進學門內次領域與學門之間跨領域合作者。

由於政治學門並無類似經濟學 EconLit 的完整學術著作資料庫，因此本工作小組不得已採雙軌並進：一方面蒐集近五年國內政治學者相關期刊著作、專書、專章、以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清單，逐步建立「國內政治學者近五年出版著作資料庫」；另一方面則依照上述四項原則，初步整理目前國內政治學者在期刊論文、專書及專章著作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上比較重視之研究議題，並展望國內外政治學界的發展趨勢，衍伸出相關的重要關鍵字詞，於建置中之資料庫裡進行

搜尋整理，以瞭解目前國內學者關注的議題分佈，同時與國外十五份 SSCI 期刊資料庫所搜尋的結果，進行對照比較後，歸納成以下四大議題方向：憲政與選舉、認同與衝突、民主與治理、質量整合方法論與研究方法，並針對此四議題的重要概念、相關研究子題，做一扼要的說明，希望作為國內學界未來研究重點與發展趨勢的參考。此四大議題及其子題與工作小組之四項規劃原則的關係，可摘述如下表：

表一 四大議題與工作小組四項規劃原則之關係

議題 原則	憲政與選舉	認同與衝突	民主與治理	質量整合方法 論與研究方法
台灣獨特議題	✓	✓		
有國際競爭力	✓			
有潛力成為重要 議題但著墨不深		✓	✓	✓
促進跨領域合作	✓	✓	✓	✓

工作小組於規劃過程中，除先後召開十九次工作小組會議外，並：

- 一、於 2005 年 11 月 30 日向國科會人文處呈報前兩項議題之初步規劃。
- 二、於 2006 年 10 月 22 日假社科中心（中研院經濟所）召開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期中說明會，向國內政治學界說明四項議題規劃之原則與內容，並於廣泛交換意見後，根據與會先進之建議將「政治思想」及「政治經濟」之相關研究主題融入四大議題，局部修正本計畫之期中報告。（期中說明會會議記錄，請詳見附錄三）
- 三、於 2006 年 12 月起規劃更廣泛之意見徵詢（詳見本章第三節及附錄四）。
- 四、於 2007 年 5 月下旬網路意見徵詢告一段落後，根據回覆之意見將「分配正義」之理論及政策面納入議題一及三。

### 第三節 學界意見徵詢

誠然，本工作小組所擬定之四個熱門及前瞻議題不可能窮盡，難免掛一漏萬，惟以此四大議題做為核心探討，希冀在未來的政治學領域創造、整合出更多的績優團隊，並能進一步促進跨次領域間以及跨學門間之合作。

為了更充分瞭解國內政治學界對此四項議題之看法與意見，本計畫於 2006

年 11 月下旬將修正之第一年度期中報告送交社科中心後，即開始積極規劃意見徵詢調查。惟囿於人力與經費之限制，工作小組決定採用「網路問卷為主、紙本郵寄為輔」的調查方式，並獲得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蕭乃沂教授慨允同意協助網路問卷調查，使後續之意見收集與分析得以順利進行。

本計畫意見徵詢之網路及紙本問卷內容，請參見本報告書附錄四之附件二及附件三。其進行之流程摘述如下（詳細之「意見徵詢進度表」請見附錄四之附件一）：

- 一、陳敦源教授蒐集彙整國內政治學相關系所及研究單位之人員 e-mail 清單；蕭乃沂教授將工作小組所擬之問卷上網進行測試、修正。
- 二、2007 年 3 月 1 日助理根據 e-mail 清單發出第一波網路問卷；3 月 9 日針對清單中無 e-mail 信箱者郵寄紙本問卷。
- 三、3 月 13 日發出第二波網路問卷；3 月 22 日寄出第二波紙本問卷。
- 四、4 月 9 日發出第三波網路問卷；4 月 10 日寄出第三波紙本問卷。
- 五、至 5 月 22 日止，共回收 271 份問卷，回收率 32.1%；其中網路問卷 254 份、紙本 11 份。
- 六、回收之有效問卷在性別、職級、公私立單位等變數的分佈上，與母群清單比較，卡方檢定顯示均無統計上之顯著差異（摘述於表二，詳見附錄四之附件四），因此樣本之代表性尚佳，故無須加減權。

表二 問卷回收之樣本代表性檢定

表二之 1 性別部分

性別	母群數	回覆數	回覆率
男性	715	224	31.33%
女性	129	44	34.11%
拒答	0	1	
遺漏值	0	2	
總數	844	271	32.11%

性別	母群數	母群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男性	715	84.72%	224	83.58%
女性	129	15.28%	44	16.42%

卡方檢定： $X^2=0.2678$ ,  $df=1$ ,  $p>.05$ , 無顯著差異

表二之 2 職級部分

職級	母群數	回覆數	回覆率
教授/研究員	271	71	26.20%
副教授/副研究員	293	96	32.76%
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	242	91	37.60%
講師	38	8	21.05%
拒答	0	3	
遺漏值	0	2	
總數	844	271	32.11%

職級	母群數	母群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教授/研究員	271	32.11%	71	26.69%
副教授/副研究員	293	34.72%	96	36.09%
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	242	28.67%	91	34.21%
講師	38	4.50%	8	3.01%

卡方檢定： $X^2=6.7406$ ,  $df=3$ ,  $p>.05$ , 無顯著差異

表二之 3 公私立學校或研究單位回覆部分

	母群數	回覆數	回覆率
公立	473	154	32.56%
私立	371	110	29.65%
其他	0	3	
遺漏值	0	4	
總計	844	271	32.11%

	母群數	母群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公立	473	56.04%	154	58.33%
私立	371	43.96%	110	41.67%

卡方檢定： $X^2=0.5636$ ,  $df=1$ ,  $p>.05$ , 無顯著差異

意見徵詢問卷之第八題（八之一至八之八），係依序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規劃之四項議題為熱門議題、前瞻議題，工作小組於剔除缺漏值過多之問卷後，根據 257 份有效樣本整理摘述於表三。該表顯示，國內政治學界有將近八成五同意「憲政與選舉」、「認同與衝突」、「民主與治理」這三項議題為受到矚目之熱門議題，而且也有相當高的比例（約六成九至八成三）認為這三者亦為前瞻議題。不過誠如預期，第四項議題「質與量整合之方法論與研究方法」在學界的共識比較

低，僅五成六左右同意其為熱門議題，但儘管議題四比前三者相對「冷門」，也仍有六成五的學者同意其為前瞻性議題，對政治學的未來發展將有重要影響，應予以重視。

表三 國內政治學界對四項議題是否為熱門或前瞻之意見

	憲政與選舉		認同與衝突		民主與治理		質量整合方法 論與研究方法	
	熱門?	前瞻?	熱門?	前瞻?	熱門?	前瞻?	熱門?	前瞻?
同意	86.8%	68.5%	84.8%	75.5%	87.9%	82.5%	55.6%	65.4%
不同意	9.8%	28.0%	12.4%	21.8%	10.1%	15.2%	40.9%	30.7%
無法判斷	3.5%	3.5%	2.7%	2.7%	1.9%	2.3%	3.5%	3.9%

有效樣本數=257

為了讓學界能更充分地表達其他意見，問卷之第九題至第十一題為開放題，供受訪者自由填答。第九、第十題分別詢問「請問您覺得國內外政治學界還有哪些熱門、前瞻的研究議題」，第十一題則請其陳述對問卷附件之期中報告的其他意見。工作小組登錄並綜合整理第九、第十題之回答（詳見附錄四之附件六 Q9-Q10），發覺除部分建議純屬研究領域而非實質議題外，大多數填答之議題均可整合歸入原四大議題（其中又以歸入議題二及議題三居多）、或涉及跨數個議題性質者。第十一題填答人數較少（見附錄四之附件六 Q11），所建議之議題仍屬議題二、議題三或跨二及三者居多。填答 Q11 者雖有 5 位質疑四項議題並不具代表性，但也有 22 位給予「用心良苦、著力深遠」等相當正面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填答 Q11 者有 4 位憂慮「熱門及前瞻議題」的規劃，可能影響未來研究資源分配之政策，進而導致非屬「熱門及前瞻議題」的研究方向受排擠的問題。由於研究資源分配政策並非本工作小組之權責，故在此轉述部分學者的顧慮，供社科中心及人文處參考。

## 第二章 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議題之規劃

### 第一節 議題壹：憲政體制、選制變革之政治與政策效應

台灣的政治發展，已從威權轉型的動盪時期，進展成為民主鞏固的制度建構時期。2005年六月國民大會以249票贊成、48票反對、1票廢票完成複決修憲，其內容主要包括廢除國大、公投入憲、立委席次減半、立委選舉由目前之「單記不可讓渡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等，這不僅對我國之憲政體制、選舉制度是一大變革，而且對於政黨消長、競選策略、選民之投票行為以及政策後果等都勢必影響深遠。同時2006年後，我國憲政體制亦可能還有相當幅度之變化，此一新的憲政與選舉制度之形成，及其對政黨體系、領袖菁英與選民投票行為等的影響，均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展望未來，我國政治民主深化的發展正面臨重大轉折與新的挑戰，更加值得學界長期關注並深入探討。有鑑於此，工作小組建議以「憲政體制、選制變革對政黨體系、投票行為之影響」為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之一，以期達成下列目標：

1. 掌握我國推動憲政制度改革的契機，探討制度變遷之起源、過程與後果，不但配合國家發展，並促使台灣之本土研究與國際學術社群更緊密地接軌，提升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之國際競爭力。
2. 整合關於制度之抉擇、變遷、運作、與成效等上中下游研究之制度論學理，建立一套邏輯嚴謹、證據紮實的「制度抉擇及其效應」的理論。
3. 蒐集國內、外相關實證資料，進行有系統的比較分析，建置成為資料庫與知識庫，不僅提供我國後續憲政與選舉制度改革珍貴的資訊與依據，而且提供國內、外政治學者交流與合作之平台。

此一研究議題至少有三項特別值得關注之子題：

#### 一、 憲政選擇與權力關係

在我國憲政體制之下，台灣地區政治發展所衍生的問題，是政治學中頗受矚目的「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與「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的研究主題。近年來關於我國憲法結構的修改究竟應朝向「制憲」或是藉由「修憲」，其爭論方興未艾，其憲政體制應定位為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或者混合體制，仍是眾說紛紜。此外，與憲政體制密切相關的議題，在於未來國會選舉制度的改革及其相關效應。無疑地，這些研究領域均牽涉制度選擇，而且將是未來這幾年極為重要的政治議程。在不同的憲政體制之下，其權力分立與政治運作的情況將截然不同。對於台灣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究竟何種憲政體制與國會選制改革較易維持政治穩定與裨益民主鞏固、落實政黨政治，以及減少分立政府可

能產生的弊端，係值得政治學界關注的議題。從比較政治的角度觀之，這些制度選擇對於台灣本身的政治發展，諸如政黨體制的重組與轉型，以及行政與立法關係等，均值得從理論與實務加以研究分析。除了從實際面向探討憲政問題之外，憲政的概念也回歸到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的基本命題，例如人權、自由、正義等概念。

## 二、 選制變革與政黨體系、投票行為

憲政結構（constitutional structure）固然規範了權力的分配、行使與互動的整體架構，但是在決定誰能進入該結構內扮演何種角色，選舉制度（electoral system）往往有舉足輕重的「篩選」影響力。本子題的焦點，在研究選舉制度的變遷，也就是選舉制度為何改變？如何改變？以及改變後所產生的各種影響。例如，選舉制度乃至選舉區的規劃與改變，是否需要由一個獨立超然的「選區重劃委員會」負責，即是一個重要關鍵。同時選舉制度不但與現有的政黨體制、菁英互動息息相關，更會進一步影響未來政黨體系的穩定與變遷。例如單記非讓渡制度若較有利於多黨政治，則一旦改為單一選區混合制，則對於既存的小黨將形成嚴重的衝擊。

就選民的觀點而言，不同選舉制度之下，選民採取表達偏好的行為也會不同。以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而言，如果出現三位或是三位以上的主要候選人時，民眾如果預期最喜歡的候選人未必能夠當選時，為避免浪費選票，也許會採取策略投票。台灣未來立委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勢必對政黨體系及競爭策略、族群關係、投票行為與選舉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故本子題應有系統的比較新舊選制對台灣的影響，並與其他選制亦發生變遷的國家相互比較，以驗證學理。

## 三、 制度變遷與政策效應

在「制度至關重要」（institutions matter）的大前提下，政治學者強調制度對於政治現象具有主導性的影響，相信制度的引進或設定將為行動者創造特定的誘因結構，進而規範或引導其行為，降低行動者之間的摩擦，因此不但可能提升彼此之間的協力合作，並且能夠控制不確定的成分，最後達成其治理目的。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組需要進一步澄清的命題：制度這種結構性的因素，到底如何與其他情境因素互動，共同建構其特有的政治風貌（包括行動者的動機、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以及行動者互動下的集體成果）。探討制度的影響時，非常值得重視的主題是制度競爭或衝突之下的所產生的政策風貌，以及政策執行的效能、效率，與施政結果之回饋效應。

#### 四、 憲政思想與制度意涵

憲政選擇雖然涉及權力關係，但是往往也呈現一個政治社群的自我理解。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憲政思維代表的是對權力的來源、權力的行使及權力運作方式在規範性層次上的思考。我國憲法從制定到歷次修正的過程中，有過種種關於憲政制度的論辯。當代關於制憲及修憲的討論，固然和國家認同的議題直接相關，但是憲政秩序的基本問題，仍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舉例而言，憲政民主的精神在「精英協商」或是「主權在民」？當代也有論者指出，新興民主國家在憲政思維上，往往看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貢獻，而忽略共和主義在憲政體制中的意義。馬克思主義更提醒，西方自由民主憲政恐只是資產階級的遊戲規則，普羅大眾沒有堅實的平等價值及社會福利的支撐，恐只是這場民主遊戲的工具及道具。這樣的傾向，在台灣的憲政思維中，是否也有類似的情形？雖然憲政選擇所涉及的政治過程以及權力關係，在跨國比較與實證的層次上，十分值得探討，但是制度不僅反映權力的角力，也反映價值的選擇以及歷史的遺業。當代關於契約論的討論，在分配政治的層次上，直接扣聯民主政治的基本意涵，如果憲政體制代表的是國家與人民以及人民彼此之間所訂定的約定，那麼為何約定？如何約定？以及約定內容所觸及的種種論述，都是憲政思維的一部分。因此，從思想史與政治哲學的角度而言，亦有許多值得探討的主題。

### 第二節 議題貳：主權、認同、衝突與合作

主權（sovereignty）在十七世紀歐洲隨著「西發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簽署，成為民族國家、國際關係、國際法的基礎。廿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後，主權成為國際法中規約世界所有國家權利義務的主要概念依據。國家主權的特性如：有對內與對外屬性；具有平等性（獨立權、平等權、自保權、管轄權）；具有絕對性、完整性及不可分割性等，卻因全球化（globalization）及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概念及實際興起，而一再被挑戰及重新詮釋。兩極國際體系的瓦解、新興民族及國家爭取獨立、文化多元化、資訊網絡無遠弗屆、非國家行為體（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恐怖主義組織等）活動力強等，均成為制約國家主權的要素。有關「主權」的論述及辯證，成為政治學中的重要議題。

台灣所處的政治地理情勢，其實無論就學理及實際面，都應有條件成為「主權」研究的熱門議題。對台灣政治學界而言，結合影響「主權」內涵及行使的「認同」研究，及與「主權」和「認同」密切相關的國內/國際衝突與合作的探討，是現實上迫切的議題，也是台灣可從自身經驗出發，提供國際新理論思維對話的一個實驗場。這四個分立又彼此相連的議題，又可歸納為下列三大類，成為政治



學門熱門及前瞻議題的研究項目參考。

## 一、 主權動態的概念及實際研究

「主權」概念在傳統國際法的框架中，其至高無上，不可分割等特質，都將其侷限為一種靜態凝固的實體，但在實際的政治場域中，如美國入侵伊拉克，目前廿五個國家組成的歐盟，SARS 事件中國際組織對國家主權的干預等，都對傳統靜態「主權」觀形成挑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治，也提供一種思考「主權」意義的狀態。在這些變動中的現實情勢，對「主權」這個概念而言，也需要有「動態」的界定方式及相應的研究議程。若將「主權」做動態式的概念界定，可能相關的議題有：

- (一) 「主權動態」概念、意涵、實例，對國際法、國際關係的啟示等。
- (二) 「主權動態」的原因探索，如歐洲聯盟 (EU)、獨立國協 (CIS)、台海兩岸、美國與伊拉克、賽內甘比亞邦聯 (Senegambia Confederation)、世界衛生組織 (WHO) 角色等研究。
- (三) 「主權動態」的結果，同樣可做跨國比較，或國際關係變動的推演。

## 二、 「認同」根源、發展及影響的比較分析

「認同」也是目前國際政治學界的顯學，關於「認同」的研究有兩個彼此影響的研究議程。第一個議程是對於民族國家的探索及反省。全球化及地域化的趨勢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造成衝擊。國族建立的歷史脈絡以及國族經驗如何受到國際政治秩序及國內社會變動的影響，不但是國際政治學界研究的熱門議題，也和當前台灣國家認同的爭議有密切的關聯。第二個研究議程是對於社會身份的思考及反省。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社會主義運動對於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產生重要的影響。階級認同及階級衝突在政治體制中如何解決，在不同的國家引起不同的體制性回應。一九六〇年代西方新社會運動崛起後，關於性別、種族、語言、宗教及文化的認同政治也隨之成長。近年受到全球化趨勢的影響，移民及移工如何改變國族經驗也是熱門的議題。無論是對於先進工業民主國家或新興民主國家而言，這些社會認同的動員，不但在理論上涉及差異政治的探討，牽動公共政策的變動，也在國家體制上有重塑的效果。

綜合而言，未來關於「認同」的研究，可以發展的議題包括：

- (一)「認同」根源的跨科際整合研究：結合相關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認同的起

源及基礎，包括心理、思想、文化、經濟、歷史、社會、語言的種種面向。此一子題的開展，在理論上有多種可能性。舉凡政治哲學、思想史、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及文化研究等相關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對於認同的討論，都有在理論上彼此援引的可能。當代引起熱烈討論的後殖民論述或是殖民現代性的種種議題，對於台灣而言，尤其有切身性。

(二)「認同」變遷、發展的跨域或跨國比較：關於台灣「國家認同」的研究，政治學界在實證研究上已累積一定成果，未來值得發展的是，跨域及跨國的比較。譬如台灣與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 (Catalonia) 國族經驗的比較。或是超越國境的文化或社會認同如何影響區域發展，譬如台灣新移民的東南亞背景，如何影響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以及兩岸的移居人口在兩岸關係中所造成的影響。

(三)「認同」影響的歷史、文化、賽局分析：國家機構在認同形塑上往往有巨大的影響力。不僅是國族認同如此，社會認同亦然。因此，認同或身份政治與公共政策與國家體制的關係往往交互影響。認同的變遷會影響公共政策的變動，而公共政策的變動也會鞏固或消解認同。

### 三、 衝突與合作的國內國際探討

衝突與合作是政治學中永恆的議題。超級強權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期間的衝突影響層面，涉及國際間的戰爭與和平。國際間的權力競逐對國內政治、國家安全選項的影響，不僅是台灣面對的情勢，也是目前政治學中「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兩個次領域，愈趨接近的整合研究主題之一。對台灣而言，國內與國際的衝突與合作，涉及的層面包括美國、中國甚至是日本。

自古代的西方的世界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 (the Peloponnesian War, 西元前四三一至四〇四年) 以來，國際政治的衝突永遠不斷，衝突與戰爭起源通常包括有形具體利益衝突 (領土爭端、國家政府掌控權、貿易摩擦與資源爭奪)，及無形思想衝突 (族群衝突、宗教衝突、意識型態衝突)。解釋戰爭的原因至少有個人、國內、國際及全球等四個層面。另一方面，衝突的地域也發展成具有全球性及廣泛性，疆界不再是安全的保障。威脅與衝突涵蓋面擴大包含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環境等領域。國家在衝突之中，不再只是較量硬權力 (軍事力量的對抗衝突)，也包含軟權力 (價值、觀念、文化、制度面的國力)。隨著核子、生物、化學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發展失敗的國家及非國家行為者如恐怖主義組織，使國際衝突的時間、方式、毀滅性、控制、解決等，均面臨新增的面貌與詮釋。

在亞太地區的國際衝突或戰爭除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之外，北韓核武發展與朝鮮半島危機、台灣海峽飛彈危機、東海與南海島礁及能源競奪、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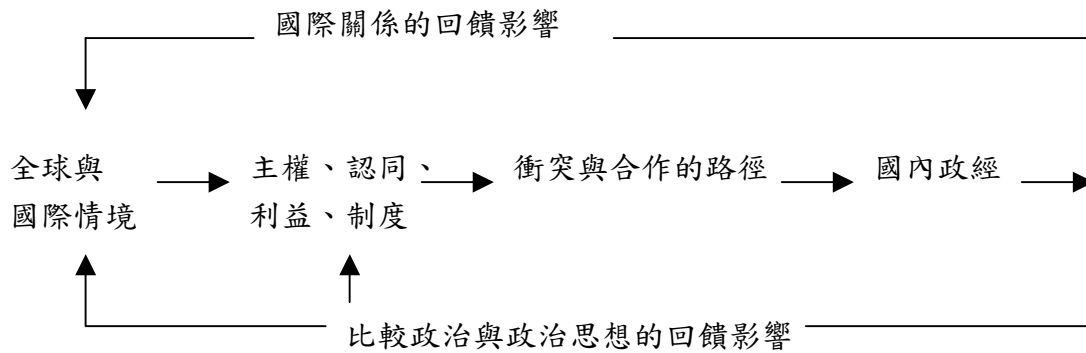
與中國兩強競逐、中國與越南戰爭、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克什米爾戰爭等，涉及到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衝突及其預防、危機及其處理、軍事結盟及其運作、恐怖主義及反恐戰爭、核嚇阻與圍堵戰略等議題。有國際衝突就必須思考如何解決衝突，因此，諸如：多邊主義、使用武力規範、國際法、大國協商、結盟、聯合國、談判、武器管制等機制，也成為探討的焦點。

若戰爭、衝突屬於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主要的研究範疇，國際機制、國際合作則屬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關注的焦點。國際合作共創絕對利益，而非相對的獲益，一直是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論辯的核心。國際合作、安全合作在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討論中，不僅具有學術探討的價值，也成為國際建制、國際組織、安全對話的政策實務操作。除「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之外，後冷戰時代興起的亞太國際組織幾乎均以「合作」為名，例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上海合作組織」(SCO)、「亞洲合作對話」(ACD)、「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等，強調合作概念與合作安全。國家之間經由國際合作，建立處理程序、對話協商、和平解決等，進一步追求共同安全，甚至形成安全共同體，顯然成為亞太安全的最熱門議題。

有關國際關係或跨地域衝突與合作的相關議題，包括如下：

- (一) 道德公義、正義之戰與國際政治；國際體系和衝突原因層次；權力平衡、集體安全與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的戰略、目標、威脅、發展與結束；國防戰略與武器發展(核戰略、飛彈防禦、有限戰爭、全民國防)；兩岸關係與三戰(法律戰、心理戰、輿論戰)；恐怖主義組織及反恐戰略；危機管理與預防；領土與能源爭議；軍事同盟與國際衝突等。
- (二) 在國際政治經濟(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部分，除傳統的國際貿易、跨國公司、國外投資、外債減免、國際發展的議題外，涉及亞太政經新興的議題包括：環境保護；愛滋病、SARS、禽流感等衛生安全；兩性平權、人權保障；資訊網路治理；移民與人口流動；洗錢防制、毒品走私、貨櫃安全倡議(CSI)、海事安全倡議(MSI)等反恐措施；民主、課責(accountability)與國際機制；世界貿易組織與五大主要爭議如農業協議、紡織品與服裝協議、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議等；東協與區域外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更緊密經濟夥伴安排(CEPA)；經濟互賴與區域整合；亞太經濟合作、東亞高峰會等。

未來議題貳可以構思的議題關係或可圖示如下：



圖一 主權、認同、衝突與合作架構圖

### 第三節 議題參：治理--民主課責、政府角色、與政策設計

美國政治學會第一任政治學會會長 Frank Goodnow 曾經在 1904 年表示，政治學研究的範圍應該涵蓋完整的「國家」(state) 意義，主要包括國家意志形成的系絡、過程、以及實現等三個部份，過去一百年政治學的發展，逐漸聚焦在以國家意識形成過程為主要的研究，而將政治過程的脈絡及實現放在次要的地位，事實上，以公共組織為主的國家機構，在國家既存的系絡中，決定國家意識的實踐，這個過程不但無法與環境切割，也無法忽略選舉機構與官僚機構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近年來在政治學界興起以「治理」(governance) 為主要概念的討論，一方面討論「國家空洞化」(hollowing-out state) 趨勢下的公共統治，另一方面也隱含回到 Frank Goodnow 心中認定政治學應該研究完整國家的意義。

#### 一、治理研究的意義

Jon Pierre and B. Guy Peters 認為，治理一詞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吸引人的概念，並不是因為它的內涵已經十分清楚，而是在於「它將政治系統及其環境加以連結，並使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案更具政策的關連性 (policy-relevant)」；世界銀行對治理有下面的定義：「一國當中，權威實現的過程與制度 (the process and institutions by which authority in a country is exercised.)」，雖然治理一詞最早的根源十四世紀的法文中，是指皇室的官員，與權威統治或是政府掌控社會的程序無關，但是，這個名詞在當代重新被重視，主要是試圖描繪並回答二十一世紀的政府，是否 (或是應否) 具備擔綱社會主要統領地位的能力，以及如何讓政府在扮演適當的統領角色上，具備相關資源與方案管理的能力，一方面學者從國家中心論來探討跨越政府部門的統治議題，其中包括傳統上研究政府是如何被選擇、替換、課責 (accountability)、以及有效運作，另一方面則是站在社會中心論的概念下，將國家視為社會中各種勢力互動的參與者之一，並據此來討論各種權威實現的過程與制度。針對政治學在這個領域上值得投入的面向與議題，茲就下列三

個方向分述之：包括民主國家的政府運作、政府角色的扮演與限制、以及公共政策的決策與執行。

## 二、 民主課責的政府運作

美國前總統與政治學者 Woodrow Wilson (1887) 曾經說過：「行憲比起制憲來說，是一國越來越應該嚴肅面對的議題 (It is getting harder to run a constitution than to frame one.)」，台灣的政治現實讓學界關注制(修)憲但是卻忽略行憲的研究與重要性，事實上，台灣浮動憲法的大環境，反而能夠凸顯行憲問題在憲政體制運作上的重要性，以及以台灣作為一關鍵個案研究的意義，因此，對於「行憲」(running a constitution) 的相關研究，可以包含下面的三個方向：

- (一) 憲政體制與國家運作的研究：包括分權制衡、行政效率與行政立法關係 (separation of power,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legislative-executive relationships)、司法審查權與行政裁量權 (judicial review and discretion)、預算政治 (budgetary politics)、以及行政領導 (executive leadership) 等議題。
- (二) 政治與行政關係的研究：包含民主回應性 (responsiveness) 與專業責任 (responsibility) 之衝突與妥協、透明與課責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與部際與府際關係 (interagency and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等議題。
- (三) 政黨輪替中的行憲研究：包括政黨輪替過程之制度化議題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turn-over)、政黨輪替與政府可信承諾與文官中立 (credible commitment and neutral competence) 的問題研究、與政務人員與事務人員關係與文官績效管理 (忠誠與能力抉擇 the dilemma of loyalty and competen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等議題。

本項議題中，特別是民主化過程中官僚體系之調適變遷對民主化成果的影響方面的研究，「民主化與台灣官僚體系改革」的主題，最有可能成為一個引領台灣進軍國際學界的關鍵議題，其理由有三。

其一，過去民主化的制度選擇研究，主要是放在憲政與選舉體制的選擇上，並以此為討論轉型政治的關鍵制度性變數，然而，官僚體系是國家統治的「常設機制」，它往往是改革的對象，也是維繫所有政治改革穩定的基石，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選舉制度。比方說，我國的考試院世界上少有的獨立院級人事機關，它在民主化之前後的運作中，對政黨輪替的穩定性以及文官中立的影響，進而對民主鞏固理想的達成，有深入研究並向國際發表的價值。

其二，政治學門因為分工的關係，從行為主義革命以後，就不熱衷研究政治組織 (包括政黨與官僚組織)，而將這一塊放在公共行政學門當中，但是，公共行政學門近年也將重心放在效率價值的追求之上，較為輕忽民主價值的融入，將政府組織的運作研究，從政治脈絡中抽離了出來，這樣的學界發展，讓研究民主

化過程中官僚體系的議題，成為一個重要的三不管地帶。

其三，美國作為政府組織研究的領導國家，根據其行政學者 Dwight Waldo (1990) 的看法，其國家發展是先有希臘（民主）、再有羅馬（行政），因此較為忽略民主化因素與行政官僚的相關研究，對照起來，台灣的國家發展，是先有傳承自中國與日本行政體制的「羅馬」存在，之後才於近年加入「希臘」的元素，這樣的發展順序，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並發展對照理論的狀態，加上傳統西方社會科學從韋伯（Max Weber）以降，對於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最鮮明的印象就是其「官僚體制」（bureaucracy），更加上許多其他民主化國家的轉型過程，都有與台灣相同先羅馬後希臘的進程，極需相關理論與經驗研究的提出，作為新的研究核心。

### 三、 政府角色的扮演與限制

政府在實踐公共意志的過程中，一直具有角色的爭議，公共經濟學者從資源配置與社會福利的角度，討論「政府介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社會事務的範圍與方法，比較政治學者也常以「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或是「管制國家」（regulatory state）的概念來討論，國家的角色與功能是研究政府治理最核心的問題之一；然而，近來國家公共治理權威的展現，已經不止侷限於以政府為主的思維，多元中心的治理模式（polycentric governance），一方面將非政府組織、或是國際組織參與國內公共治理的現象常態化，另一方面也將提倡審議參與（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作為政府最新的治理元素，因此，對台灣學界而言，相關的研究焦點可以包含下面的三個方向。

- （一）跨部門與全球治理的研究：包括政府與企業及第三部門關係（the third sector, 包含外包、BOT、社會福利輸送等研究）、國際組織與在地政府（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研究、以及準政府組織的運作研究（quasi-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獨立委員會、管制機構或是政府出資的財團法人）等面向。
- （二）參與式治理研究：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論與實踐包含公民會議（citizen conference）、審議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公民接觸（civic engagement）等；參與式政策分析與規劃（participatory policy analysis and participatory planning process）；以及公共資源分配與管理參與度研究（participatory institutions of public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等面向，最後一個面向牽涉到「分配正義」（distributional justice）的問題，也是民主治理研究一個重要的面向。
- （三）電子化治理（e-governance）之研究：包括電子化政府的政策執行與組織再造（e-govern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organization）、網際網路、民眾參與和政府資訊公開（internet,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電子化民主的理論與實際（e-democracy）

等研究。

本項議題當中，以台灣的民主發展為背景，從民主治理機制的設計與評估的研究方向切入，以「民主治理機制的設計與評估」為研究核心，最能夠發展出與國際接軌的學術領域，其理由也有四點：

其一，包括先進民主國家在內，回答「民主政治運作是否可能」的問題 (Is democracy possible?)，一直是許多研究背後最主要的研究目的，除了選舉的過程以外，一般決策過程以民意為依歸的要求下，要如何將民眾意見融入政府日常政策決策過程，一直是除了選舉過程之外，學界所關心的治理問題，而政府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政治學界必須回答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政府的規模應該多大？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發展的正當性為何？

其二，國家體制作為一種配置稀有資源以及必要負擔的規範 (allocate scarce goods and necessary burdens; Elster, 1992)，必定要碰觸到如正義或是平等的問題，綜合上述，如何尋找兼顧「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與成本效益的民主治理機制，是台灣學界可以投注並與國際接軌的領域。分配正義在民主治理研究中主要的方向，可以說是社會福利體制的研究，有下面三個方面可以進行：

- (一) 社會福利政策的理念及形成過程：社會福利政策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因此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相關論述往往會反映國家或是不同的社會部門對於社會正義的基本概念。除了論述以外，對於政策形成過程的探討則往往能歷史性的呈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方式，以及社會階級或社會部門之間的關係。
- (二) 社會福利體制的意涵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社會福利體制的設計，是具體的資源分配及責任承擔的機制。同樣的社會福利政策，譬如健保，不同的體制設計不但反映政策形成過程中政治角力的結果，也在資源、責任、及風險承擔上有完全不同的意涵。體制意涵上的差異，也往往是不同國家民主實踐上的差別，有時是程度的差別，有時是方向上的差別。
- (三) 社會福利政策的重分配效果：政策理念或體制設計，都蘊涵著對於社會正義及資源分配的想像。此一想像是否真的實現，必須具體的評估、計算、或驗證福利政策的重分配效果。此一議題的研究，往往因為在量化基礎上進行跨時或跨國的比較，而能成為政策評估的重要依據。

其三，民主國家運作在多元主義 (pluralism) 的背景之下運作，一方面代表了政治平等 (political equality) 的理念，另一方面，根據 James Buchanan 與 Gordon Tullock 提出「共識的算計」(calculus of consent) 理論，民主運作也可能是一個成本效益的問題；因此，新的通訊與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發展、新的組織設計原則 (organizational design)、新的權力分

享機制 (power sharing mechanism)、或是推陳出新的政府管制方法 (regulatory schemes)，包括管制政策與管制機構的設計，都可以藉由準實驗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而來評估不同制度設計間的良窳，也就是一種比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不論在理論或是實務上，都能發展與國際學術對話的研究。

其四，影響治理績效的因果關係研究，或是對於「善治」(good governance) 的理論與實務需求，已經成為許多關注區域發展的世界組織 (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對治理知識需求的新焦點。由於改革的呼聲不斷，以民主課責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為核心，以績效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為方法的政府改造運動，已經成為重新檢視政府運作的重要切入點；台灣做為一個後進的民主國家，許多民主治理機制 (包括選舉制度但不只是選舉制度) 仍然處在發展階段，研究的投入不但可以透過國際組織展現台灣的發展經驗，以包括代理人理論 (agency theory)、機制設計理論 (mechanism design)、或是新制度論 (new institutionalism) 的結合，將一方面有助於台灣個案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讓國家體制改革能夠站在「實證基礎」(evidence-based) 之上。

#### 四、 公共政策的設計與改革

政府治理的分析可有兩種分析取向：一是以組織或是制度為單位，另一則是以公共政策為分析單位。從國家意識形成的背景、過程於實踐的角度來討論公共政策的政治面議題，學者 Gill and Meier 曾說：「如果政治學者研究 1992 年選舉，作了一個錯誤的預測後果並不大，柯林頓仍然會當選，但是，一個公共行政學者研究一個教育政策時犯了大錯，因為他的研究會影響政策走向，後果是較為嚴重的」，因此，公共政策研究也是政治學者研究治理不可忽略的層面，而這個部份必須與前面兩個部份一起結合討論，也就是說，在民主治理的環境中，政府站在某種既定的角色上，從事公共政策設計與改革的工作，也應該是政治學者一個注目的焦點，更重要目前台灣正從「從上到下」的威權政策設計的典範，轉變到「從下到上」的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典範的過程中，相關的研究包括下面三個方向。

- (一) 公共政策設計與決策的研究：多層次政策協調機制 (policy coordination in multi-level system)、政策多元利害關係人之政策網絡及政治可行性研究 (policy networks of multiple-stakeholders and political feasibility)、以及政策審議、媒體、與政策論述 (policy deliberation, mass media and policy argument)、政策共識建構與衝突解決程序 (policy consensus-build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procedures) 等研究。
- (二) 公共政策分析與評估的研究：成本效益分析與公共政策分析 (benefit cost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analysis)、風險修正與公共政策評估 (risk adjustment and policy planning)、系統動力學與政策分析研究 (system dynamics and policy analysis)、以及方案評估的方法論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program evaluation)、管制政策影響評估 (impact analysis of regulatory policies) 等研究。

(三) 公共政策的維繫與改革：包括政策執行結構的研究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ucture)、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的固著與緊縮 (welfare state social policy entrenchment and retrenchment)、制度變革與政策延續、變革與終止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olicy persistence, reform and termination)、以及 制度否決點與否決者 (institutional veto points and policy veto players) 的研究等。

這個部分可以發展熱門與前瞻議題的部分，應該分為方法、結構與內涵三個部分，我們可以定名為「公共政策的科學化與個案研究」。首先，在方法論的方面，公共政策的分析與評估，牽涉到繁複的方法設計與執行的問題，也需要在分析或評估方法上的進深研究，這個部份在實務上的操作雖然較學界先進，但是仍然需要方法論的研究來深化其應用效益，不論從應用或是方法論的發展上，都可以藉由人力與時間的投入，讓公共政策的科學背景更加成熟。

再者，因為公共政策議題不會隨著行政組織的框架發生，真實世界中充滿了跨越疆域的公共政策議題，近年來不論在跨國界的政治議題 (SARS、反恐等)、跨越地方政府界限的政策議題 (河川治理、犯罪防治等)、以及跨越政策領域的政策議題 (自然災害防救等)，都是需要跨域政策統合機制的存在，這方面的需求，隨著全球化以及民主化的雙重浪潮而益形重要，也成為台灣公共政策研究可以與國際接軌的關鍵方向。

另外，在特定公共政策議題團隊的建構方面：台灣可能可以在世界上站一席之地的政策研究包括三個政策領域：(一) 經濟發展 (包含科技政策) 政策、(二) 社會政策 (包括健保、老人、及人口政策)、(三) 環境永續發展政策等。比方說，以台灣的全民健保政策為例，該政策在國際健保政策研究的學圈中，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國內以公共衛生以及社會學研究取向為主要的研究學群，亦已經存在，然而，因為台灣健保政策背後國家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但是卻是研究最少的面向，對於政治學門以研究公部門為主的取向，可將健保政策作為各項政治相關研究的關鍵案例，當然，這樣的投入也有跨領域專業結合的意義，應該可以成為另一個台灣公共政策研究與國際接軌的一個契機。

#### 第四節 議題肆：質與量整合的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本係任何學科研究之根基，然而鑑於國內政治學界對此一領域似僅限於口頭之重視而較欠缺實質之投入，故本工作小組選定「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為前瞻議題之一，主要目的在於點出幾個國外已經發展且有潛力發揮引領作用、但國內卻尚少著墨亟待推動的議題，希望引起學界之注意並投入人力與

資源，為目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多方爭議尋找出相輔相成、截長補短的整合之道，以化解學派之間的爭議與隔閡，促進整體社會科學知識的融合與成長。

## 一、 質量並用方法論與研究法 (Mixed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由於社會現象本質上便兼具個體的獨特性與群體的共通性，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便逐漸產生了質化 (qualitative) 及量化 (quantitative) 二大研究取向的分野。質與量的研究方法各有其不同的擅長領域與研究議題，綜觀質性研究方法的優點在於深入了解不同領域研究對象的細部差異特性，但其缺點在於無法大規模的解釋普遍的現象。量的方法雖得以彌補這方面缺失，然而有時在解釋研究對象的特性時，無可避免的不若質性研究方法的詮釋來得深入。因此「方法論」議題的當務之急，便是化解質與量兩元對立的迷思，促成質化與量化研究的融合。

儘管學界呼籲整合質與量的方法與資料，其來有自，惟對於如何貫徹，則仍不免陷於典範之爭而眾說紛紜。直到近十年左右，「質量並用方法論」(mixed methodology) 的架構才逐漸浮現 (參見Tashakkori and Teddlie 1998; 2003; Creswell and Clark 2007等)，值得政治學者之正視，並對下列問題深入探討：

- (一) 在科哲的層次上以實用論 (pragmatism) 為最高原則，強調研究目標之務實 (practicality)：也就是以增進我們對政治社會現象的瞭解為宗旨。因此，如何在不同的典範與學派間搭橋鋪路，是當務之急。
- (二) 在落實「質量並用研究法」上，研究者如何針對議題 (research question) 的特性，從研究設計 (research design) 的階段便進行下列具體的規劃，以便建立資料蒐集、分析與詮釋的一貫邏輯與步驟：
  1. 比重之大小 (weighting)：整體設計係質與量並重 (QUAN+QUAL)、量為主質為輔 (QUAN+qual)、抑或量為輔質為主 (quan+QUAL)？
  2. 時序之先後 (timing)：研究步驟係質量並行 (concurrent)，抑或有先後順序 (sequential)？如有先後之分，則是先量後質、抑或先質後量？
  3. 並用之方式 (mixing)：質與量的資料在詮釋與分析上係交互為用 (merge)、主輔鑲嵌 (embed)、抑或前後連結 (connect)？

在「質量並用方法論」的議題下，工作小組亦針對質性和量化實證研究規劃了若干子題。實證部分，將於下節「實證政治學」中詳述。質性研究的部分，則建議可考慮重點推展下列方向：

- (一) 民族誌途徑 (Ethnographical Studies)：在質性研究的傳統中，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及書寫方式，佔有很重要的傳統，也是當代人類學及社會

學的主要研究方法 (Fetterman 1998)。事實上，政治學的研究往往涉及對於政治過程的敘事 (narrative)。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置身於其研究的環境中，近距離的觀察相關的人與事，然後將其觀察，從理論的觀點呈現為一個故事。這樣的書寫方式其實近似民族誌的書寫 (ethnography)。簡單的說，在特定時空下對特定人群進行密集的訪談，是構成民族誌的一部分，但是並不等於民族誌。然而，就政治學的發展而言，民族誌的定義並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及書寫方式，其中關鍵性的概念是脈絡化 (contextualization)。實證研究中的調查數字或是訪談紀錄，都是敘事中的文本 (text)，對這些文本的正確呈現，高度依賴對於脈絡 (context) 的細緻理解。因此，在方法論上，實證的政治學研究與民族誌之間存在許多對話的可能。

- (二) 質性資料分析方法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基於質性資料的深度，在注重脈絡的前提下，亟需發展更有系統、更有效率的方法，整理、歸納文本 (texts)、論述 (discourse) 與影音等之質性資料 (Miles and Huberman 1994; Auerbach and Silverstein 2003; Richards 2005)。此外，也有部分的質性資料頗有量化的潛力，可藉助資訊科學發展的方法促進質量的結合。此點將於第三節之「資料採礦」中說明。

## 二、 實證政治學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實證政治理論在政治學的源起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時間，真正開始全面發展也已經有二十餘年的時間，它在政治學研究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已經成為推動政治學成為「正常科學」(normal science) 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因為實證政治學影響力日增的態勢，在 2000 年左右於美國學界曾發生「改革」(Perestroika) 的爭議，但是這爭議並未影響實證政治理論重新形塑政治學研究風貌的大方向，因此，實證政治學將持續維持其做為推動政治學科學化的主要動力，它也將是台灣政治學界必須注意的一個前瞻性的方法論議題 (林繼文，2005)。

實證政治學是藉由分析模型了解政治現象的一個研究取向 (research approach)，從方法 (method) 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個體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政治學領域的應用；從內涵 (substance) 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經過理論模型預測，並藉由經驗研究來驗證政治本質的學問，這種知識生產的觀念近來逐漸發展出「理論模型之經驗意涵」(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oretical Models, EITM) 這個新觀念 (Granato and Scioli 2004)，主要是希望實證政治學的發展不能只著重理論與模型的發展，必須注意理論的經驗驗證。

實證政治學在 EITM 導引下的研究重點，主要是將政治過程分為：(一) 個人偏好形成與選擇、(二) 政治決策制度與過程、以及 (三) 政策結果的執行與

產生等三個部份，以社會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理論、賽局理論、新制度經濟學、資訊經濟學等相關領域的模型建構準則，針對特定的政治議題，進行邏輯演繹以及預測，並提出可驗證的假設，最後再經由經驗研究以量化為主的工具驗證理論假設的一個政治知識產製的過程，而 EITM 的相關訓練課程中，包括下面三項主要課程：(一) 制度與制度分析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二) 因果關係的經驗評估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Causality)、以及 (三) 複雜：多樣、網絡、適應、與崛起 (Complexity: Diversity, Networks, Adaptation, and Emergence)，目前，這種研究取向已經在國會研究 (包括聯盟政治)、憲政運作 (包括憲政選擇)、國際關係、司法政治、官僚控制等領域，獲得許多進展；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研究取向與 1960 年代政治學門同樣提倡政治科學的行為革命在後端理論驗證上是大同小異的，唯一的差異就是實證政治學強調在知識產製的前端，以形式理論的方式來推導出可驗證的假設。

台灣學界實證政治理論的發展，是由經濟學者研究相關政治系統議題的形式模型所展開的，之後才由新的歸國學者以政治學者身分使用形式理論方法研究政治問題，嚴格來說，實證政治學不是一個領域，它是一種研究政治學的取向，因此，舉凡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公共行政與政策、甚至政治哲學與理論，都可以以實證政治學的取向來提出看法，因此，在學界「追新」以及「物以稀為貴」的傾向，形式理論的論述具有相當的國際發表潛力。

然而，台灣政治學界缺乏有系統實證政治學訓練的環境，是阻礙學界朝向實證政治學發展最大的因素，目前除了仰賴國外學界訓練博士人才外，國科會可以朝下列三方向鼓勵發展：

- (一) 鼓勵政治學者有系統的發展嚴謹之「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 研究設計，包括各種「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s)、以及非實驗但仍講求因果分析之「觀察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 參見 Rosenbaum 2002; Rubin 2006)，並將之應用於在地具有國際發展潛力的政治學相關議題，以檢驗形式模型推導出來的假設，更落實 EITM 之理念。
- (二) 持續支持政治學門暑期「計量方法研習營」等活動，以短期密集課程的方式，培訓碩博士研究生從形式理論到實證研究的整體思維能力，彌補在校課程的不足。年輕學者亦可鼓勵積極參與。
- (三) 重點支持政治學門與經濟學門 (包括財政學) 的人才交流，著重在研究計畫與論文合作發展。

### 三、 資訊科技與政治學研究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Studies)

學門領域之間的分工固然是為了專精與效率，但也無形間豎立起藩籬，阻礙了整體知識的融合與發展，造成所謂「隔行如隔山」的現象。然而政治學研究如欲達成質量兼顧的目標，途徑之一就是借力使力，亦即結合其他領域已經充分發展的方法快速而有效的達成目標。近年資訊科技的進展一日千里，台灣尤為箇中之翹楚，其優勢在以高效率處理大量、繁複且性質龐雜的資料，從中萃取出系統並易於理解的訊息。此一趨勢，與政治學研究希望能兼顧質的深度及量的廣度，頗有不謀而合之處。其中又以地理資訊系統、資料採礦、人基模型的應用，最具潛力。

(一) 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地理資訊系統係一套整合各項空間資料 (spatial data) 與屬性資料 (attribute data) 的資訊化作業系統，其架構於一完整豐富的地理資料庫之上，並具有資料儲存、展示、查詢、處理、分析等不同功能 (Longley et al. 2001)。GIS 最重要且最具實際價值的，是在它提供了整合質與量資料的作業平台，將量化與質化兩者的長期資料經過套疊之後，轉化為社會科學詮釋長期及變遷上有用的資訊，且將資訊最快速而清晰地傳達給讀者，並能加強地域上差異的認知與建構長時期的資料庫 (Steinberg and Steinberg 2006)。政治學中與地理有關的概念甚多 (Key, Jr. 1949; Johnston and Pattie 2006)，諸如地緣政治、勢力範圍、派系地盤、票倉等，均可以 GIS 為平台，一方面以區位推論 (ecological inference) 貫穿群體與個體層次的分析 (黃紀 2001; King, Rosen, and Tanner 2004)，另一方面結合質化之文化社群資料與量化之政經行為資料，進行更深入的脈絡化研究。

(二) 資料採礦 (Data Mining, DM)：資料採礦結合了統計、電腦、人工智慧、資料庫科技等領域，強調以彈性及高效率的方式，從大量而龐雜的資料中，篩選辨識出共通之模式 (pattern recognition)，極適合初探性研究 (exploratory research) (Bozdogan 2004)。DM 包括若干已經行之多年的方法 (如群集分析 cluster analysis)，也包括比較晚近發展的方法 (如類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這些方法可以進一步應用到政治學中以質化方法建立的文字資料庫，例如立法院公報、政治人物之文告宣示、以及民調焦點團體訪談之文字紀錄稿等，進行文本採礦 (text mining)，從豐富의 文本資料中萃取出與辨識關鍵字詞之間的模式，以便進一步深入瞭解言論與行為之間複雜的關係。

(三) 人基模型 (Agent-Based Modeling, ABM)<sup>1</sup>: 「人基模型」建立在「由下而上」的思維，使用電腦模擬的方法來開展各種行為方面的複雜 (complexity) 課題 (參見Bonabeau 2002)。這個研究方法不預設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會理性地做出決策，而容許每個個體保有自己行為的差異性與習慣。ABM因此突破了許多當年為了方便分析而設的限制，將可以幫助學者探尋更多的實際及理論上的問題。所謂「由下」指的是在電腦模型設計上，讓每個個體 (agent) 都有其獨特性與相異性。所謂「而上」指的是每個個體經過一段時間後顯現的樣貌 (patterns)。研究者並不對這些樣貌作事前猜想，而是將這些樣貌當作現象來觀察、忠實地描述這些樣貌，以及探討這些樣貌形成背後的機制。因為模型設定是以程式原始碼及設定參數呈現，因此實驗設計及推論便可以接受學界的檢驗，對於客觀知識的建構將有長遠的貢獻。研究者可以利用ABM做任何領域的研究，因為在程式設計可及的範圍內，每個個體所能承載的複雜程度可以無限，所以它可以輔助分析生物學中蟻群行為，也可以幫助解釋政權的崩解。社會整體是個複雜適應系統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複雜中帶有規律，規律中充滿複雜。政治學研究者可以在ABM中使用簡化的設定進行到賽局理論 (game theory) 的動態分析，也可以讓數以千計、包括數十個變項的個體做長時間的互動模擬。應用ABM在政治學界的重要次領域，如選舉行為與民意形成是個新的嘗試，尤其是無法以民調、訪談、觀察等方法蒐集實證資料的較敏感課題，亦可透過人基模型依學理之推測規則加以模擬並修正，它的發展值得新一代學者的投入與應用。

---

<sup>1</sup> 「人基模型」係工作小組邀請中山大學劉正山教授撰稿，特此致謝。

### 第三章 四大議題之研究與出版近況分析

為了更精確掌握前述四大議題在國內外的研究與出版近況，本工作小組依照四個議題的重要內容擬出相關關鍵字 (keywords)，以這些關鍵字在建置之資料庫中搜尋相關的著作，進而瞭解目前國內學者在這四個議題上的著作成果與分佈，同時將政治學門 15 個重要的外文 SSCI 期刊，以同樣的關鍵字進行搜尋，所得結果可供分析比較之用。搜尋的關鍵字清單如附錄一。

本計畫建置之資料庫，是以國科會政治學門提供之「九十四年度國科會計畫申請人著作清單」為依據，將清單中每位申請人於計畫中所列出的歷年著作，將其 2000 年 (含) 之後的著作鍵入「RefWorks 個人線上文獻參考資料庫」，以此 data base 作為後續關鍵字搜尋的基礎。(惟本計畫在建立資料庫時，輸入資料僅包括國科會研究計畫、期刊著作、專書及專章著作、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其他如書評、報章評論、翻譯文章、通訊等則未列入資料庫中。) 由於國科會計畫申請書中，學者著作目錄皆僅列出年度、篇名、期刊名、出版地、出版社或者會議地點等，並無詳列關鍵字與摘要，此或為後續搜尋時之侷限。此一資料庫之搜尋結果，如表四至表六所示。

表四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搜尋四議題統計表

		議題一： 憲政與選舉	議題二： 認同與衝突	議題三： 民主與治理	議題四： 方法論	其他
國科會 研究計畫	2000	3	6	1	0	56
	2001	4	4	1	0	61
	2002	12	8	3	0	55
	2003	12	11	6	1	54
	2004	7	8	3	2	52
	2005	9	20	19	1	126
總計		47	57	33	4	404

資料來源：以國科會提供之 9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政治學門申請人著作目錄 (表 C302) 所建資料庫。

表五 「國內政治學者期刊著作」搜尋四議題統計表

		議題一： 憲政與選舉	議題二： 認同與衝突	議題三： 民主與治理	議題四： 方法論	其他
期刊論文	2000	12	25	15	4	320
	2001	24	26	14	4	319
	2002	20	37	19	1	312
	2003	24	25	26	3	302
	2004	17	32	26	1	294
	2005 (1-6月)	7	15	8	1	65
總計		104	160	108	14	1612

資料來源：以國科會提供之 9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政治學門申請人著作目錄(表 C302) 所建資料庫。

表六 「國內政治學者專書及專章著作」搜尋四議題統計表

		議題一： 憲政與選舉	議題二： 認同與衝突	議題三： 民主與治理	議題四： 方法論	其他
專書及 專章	2000	8	22	5	1	111
	2001	21	28	25	1	131
	2002	20	33	6	0	154
	2003	15	35	11	5	174
	2004	6	20	14	5	109
	2005 (1-6月)	4	8	5	0	34
總計		74	146	66	12	713

資料來源：以國科會提供之 9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政治學門申請人著作目錄(表 C302) 所建資料庫。

此外，外文出版之SSCI政治學期刊的挑選上，則是將SSCI資料庫當中被歸類為Politic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Public Administration三類之期刊，挑選出 2005 年度三個類別中影響力指數 (impact factor) 排名各前五名的期刊 (15 份期刊清單參見附錄二，各期刊影響力指數詳情參考 ISI 網頁：<http://portal.isiknowledge.com/portal.cgi>)，將其以 2003 至 2005 年的文章 (書目類型限定為Article) 標題、關鍵字、摘要輸入RefWorks，作為搜尋的data base。搜尋結果如表七所示：



表七 「SSCI 期刊」搜尋四議題統計表

		議題一： 憲政與選舉	議題二： 認同與衝突	議題三： 民主與治理	議題四： 方法論	其他
SSCI 期刊	2003	40	83	62	11	317
	2004	61	99	64	17	225
	2005	42	85	85	20	330
總計		143	267	211	48	872

資料來源：從ISI資料庫 (<http://portal.isiknowledge.com/portal.cgi>) 搜尋政治學門三次領域 (Politic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中，各排名前5名的期刊，搜尋書目類別限定為Article，搜尋年度則從2003年至2005年，依搜尋結果所建資料庫。

從以上四表來看，前三議題應屬熱門議題，議題四則屬前瞻議題。在四個議題中，以「議題二：認同與衝突」所搜尋到的篇數最多，其次則為「議題一：憲政與選舉」與「議題三：民主與治理」。不過在不同的書目類型中，議題一與議題三何者數量居次，不盡一致，例如在國科會計畫與專書專章中，議題三的篇數略多於議題一，然而在期刊論文中，兩個議題則極為接近。另一個明顯的趨勢則是，不論在何種書目類型，包括在SSCI期刊的搜尋結果，「議題四：質與量整合的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皆是四議題中數量較少的部分，或可推論議題四是屬於前瞻議題的研究領域，而前三個議題相較之下則屬於熱門議題。若再進一步比較國內學者的著作與SSCI所呈現的趨勢，國內學者著作在「其他」類的比例仍遠高於已列出的四個議題，相較之下，SSCI期刊的「其他」類則比例較低，此現象或許反映國內政治學界學者的著作方向至今仍較為廣泛，學術社群發展呈現多元分歧的情況。

如前所述，本工作小組所擬定之四個熱門及前瞻議題，不可能將所有的研究焦點包含進來，難免掛一漏萬，惟以四個議題做為核心探討，希冀在未來的政治學領域創造、整合出更多的績優團隊，並能促進跨次領域間以及跨學門間之合作。